

大眼睛的希望

解海龙『希望工程』摄影纪实

张云雁 李全 著

“希望工程”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参与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截至2001年底，中国青年基金会希望工程公告：“希望工程”共收到海内外捐款 **2,089,009,891** 元，建起8890所希望小学，累计资助了失学儿童约 **2,474,342** 名。

为了拍摄“大眼睛”等贫困农村失学儿童，解海龙花了十年时间，行程两万多公里，奔波了26个省的128个县，拍摄了近万张底片，接触了一百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为“希望工程”这场规模空前的爱心大行动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希望出版社

大眼睛的希望

——解海龙“希望工程”摄影纪实

张云雁 李全 著
解海龙 摄影

希望出版社

DAYANJINGDEXIOWA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眼睛的希望：解海龙“希望工程”摄影纪实 / 张云雁，李全著；解海龙摄影. — 太原：希望出版社，2002. 12

ISBN 7-5379-3032-5

I. 大… II. ①张… ②李… ③解…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新闻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 I25 ② J4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138 号

选题策划：琚林勇

责任编辑：侯天祥

蔡 军

复 审：陈 炜

终 审：琚林勇

责任印制：王虎保

大眼睛的希望

——解海龙“希望工程”摄影纪实

张云雁 李全 著

解海龙 摄影

*

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11.25 字数：15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 000 册

ISBN 7-5379-3032-5/I · 337

定价：28.00 元

目 录

敬畏眼神（代序）



一、用照相机推动了一场运动（3——24）

一位响当当的汉子，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地图上凡是等高线密的地方他就画圈，一共画了八个圈——解海龙花了10年时间，行程两万多公里，相当于走了两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奔波了26个省的128个县，接触了100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拍摄了近万张底片——在民族文化宫展览，照片前堆成了一座钱山，半年后，雪片般飞来各地捐款一个亿——在台湾，展期延长到81天，台北孩子哭成一片；在香港，收到捐款1000多万——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位老华人捐款12万美金设立基金会——被誉为“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当代中国摄影家”，解海龙的一张照片就能引来几座学校，希望工程接受的20亿捐款中，很多是为“大眼睛”来的



二、“大眼睛”是这样造就的（25——50）

发现“大眼睛”——名字记错了，苏明娟成了苏玉仙——这不是你家“小梅子”吗？红格小袄是证明——“大眼睛”申请了专利，印了一亿张——全国人民都认识，名气大过“董浩叔叔”，接受仪仗队“检阅”，记者、大腕轮番轰炸，多次出入人民大会堂，为江泽民朗诵过诗歌，最年轻的团中央委员（候补），照像照晕了，签字手签疼了——传言成大款了，学习下滑了，睡不着觉了——不给面子，拒绝吴小莉、崔永元采访——“大眼睛”变成“大眼镜”，解海龙要讨个说法——从“我要上学”到“我要上网”，在平和的心态中成熟



三、“肝脑涂地”与棺材小学（51——69）

刚入学三天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空调就跳楼自杀——县领导红光满面地说：“棺材小学？流动小学？解决了，早都解决了！”——解海龙真的找到了棺材小学，趴在棺材上写作业的小孩笑他：“怕甚了，又没有死人”——羊丈小学是个冰窟窿，没窗，没灯，没桌，没凳，娃娃们每天顶着凳子上学，村长“叭”地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我没本事，白活人哩！”——解海龙被“骗”到大山里，走了20里山路，“骗子”是个老师，全校师生只有四个，在磨盘上上课，其中一个孩子后来出国到新加坡上学——李辛庄小学的孩子最高兴的事是在树上上体育课——麦当劳给那些在树上上体育课的孩子捐了100万



四、怪我呀！一拳差点打没一座希望小学（70——79）

大雨如注，摇摇欲坠的“湖心小学”，学生穿雨鞋、顶漏雨，泡在水里上课——“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解海龙被人一拳打倒在泥水中——小卢老师跟了他几里地，一个头发如絮、脸色铁青、湿衣如洗的身影，成了挥之不去的定格——加拿大王华瑞老先生给漏雨学校寄来42万港元，周七家村人吓呆了，披星戴月地造了一个现代神话——看着美丽的学校、教室和两年前见过的抱腿的、玩相机的孩子，杀鸡热酒的村民，长得纸都接了好几块的感谢条幅，他抬起眼睛四处溜达，生怕眼泪流出来



五、“小光头”“大鼻涕”谁是“希望工程”男一号（80——96）

解海龙心里没有“男一号”——剃了一个光头改变了一生，失

学之际，寻找“小光头”——拍摄者、救助者、被救助者在吴小莉的牵线下在北京相聚了——解海龙站在舞台上讲了他和“小光头”的丝丝脉脉牵牵扯扯——从一个农家苦孩子变成无锡重点中学的学生——鼻涕流得正是时候，其实他喊的不是“我要上学”——收到了100多袋茶叶，每一包都写了一个孩子的名字——“大鼻涕”后来成了厨师长



六、背砖的女孩“看过来”（97——116）

女娃子上学比登天还难——马义梅背砖挣的10多元学费竟有数百张（枚）之多；刘小环背砖砸掉了脚趾盖一天才挣一毛四——不清小平同志题词了，就用刘小环写的“我要上学”——毛可风跪在父亲面前：“让我上学吧，我不吃饭还不行吗？”——杨永香姐妹俩收到20元，家里让姐姐去上学，被妹妹拽住书包说：“姐，俺也要上。”——刘德华把那个一边放羊一边在石板上写字的女娃子的照片抱在怀里，马上捐40万在沂水等县盖了两所希望小学



七、和孩子们相依为命的人（117——140）

朱东明八年挣了8064元，为学生就垫了5886元，一间房半间都是学生还的笤帚和柴禾，30岁时女朋友因他在山里教书吹了。他追她，学生也追他，嘶啦一声，他的心裂成了两半——何文广为找两个学生摔下山，在他蜡黄的脸上有几许怅惋、哀怨，那双不愿闭上的双眼诉说自己终身的遗憾和不甘——汤建英老师去了上海，惟一的消费是为她的学生们买回了一个望远镜——戴红英说别拍，背着孩子教书是违反纪律，孩子不哭不闹懂事地吃手指，下了课才能换尿布吃口奶——解海龙为教师培训基地筹款拍卖了自己的相机



八、“烤烤冻僵的小手”引发城乡 孩子的大震动大交流（141——155）

每读10分钟书就烤烤冻僵小手跺跺脚，不然就冻得站起身拿不住笔了——讲到女孩子烤小手的故事，一个孩子冲到了广播站，“噌”地把麦克风抢到手裡泣不成声，仅10分钟就捐了5300块钱——城乡孩子大交流：失物招领的盒子里，铅笔橡皮堆积如山没人认领；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头是宝贝，一块石头一面坡就是天然的纸和笔。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牛奶和鸡蛋：在炕上掏个坑当碗，一辈子没吃过饱饭。不是名牌就不穿；没有裤子，背心遮盖不住膀子和腰——城里孩子去农村把瓜苗当草拔，三天不敢上厕所——百名山区儿童进京作客引发百万捐款大行动，五六百名北京市民争抢穷孩子过年



九、爱的狂潮就这样涌来（156——174）

失去儿子的母亲哭着说我给孩子还愿来了——七个大款问：“这是真的”——的哥搞起了“北京的士希望工程”——“大眼睛”造就了上海人中的一个“另类”——一个士兵和3000名贫困学生——邓小平外孙女卓越请解海龙签名，臧天朔说你就是拍“大眼睛”的呀？牵扯出山里女孩周标亮——人民大会堂义演，场面气势恢宏，没赶上参加的十几位歌唱家联名上递意见书——到2001年底，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2,089,009,891元，援建希望小学8890多所——一个摄影记者关于明天的忧虑

敬畏眼神

(代序)

走遍全国的大街小巷，经常会发现一个农村小女孩睁着一双忧郁大眼睛的照片，立在不经意的角落，每天看着我们来去匆匆。

仔细地盯着她看，会畏惧她的眼神。也许在你贫瘠的记忆里，流失了那么多人的眼睛，可她的眼睛你一看就不会遗忘。它怯怯灵灵默默凝睇，真真切切略带哀愁，善良的人几乎没有勇气跟她对视；它对心灵有着一种无可抗拒的威慑力，它召唤你却不经许你，它震撼你又不惊动你，它让你在她渴求的眼神中沐浴，悄悄地拨动着你心坎上某根早已荒疏的弦。在“希望工程摄影展”上，一个城里的小女孩诧异地看过照片上那些破石板搭成的课桌椅和农村孩子手里那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头后，来到这幅几乎和自己同龄的“大眼睛”的照片下呆呆地看着，她流泪了，清亮得几乎没有一点污染的泪水，像是一直从她的心里往外涌流着。我们很难猜测她在想什么，但能感到一颗单纯、敏感、善良的心在震荡、在疼痛；我们也不知道她长大后将做什么，但知道生命中的这一天，当她染着一个农村小姑娘注视的眼神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时，一个灵魂不再会无止境地骄宠和自怜，不再会拒绝理解别人的苦难，也不再会吝惜付出真心真情了。

城里长大的孩子，在他们童稚的眼中，似乎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是青山绿水，所有的小伙伴都同自己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当他们跟着“大眼睛”的照片来到农村时，才发现同在蓝天下，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住高楼、看彩电；同在地球上，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喝牛奶、吃“麦当劳”。他们惊讶地发现，和他们同龄的农村孩子，在本该充满无限春光的童年里，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在那些破烂不堪的小学校，好几个年级的孩子同在一个教室里接受“复式”教育；有的孩子在“屋里无箱柜，炕上无被褥，抬头看见天，四周不挡风”的家里，仍不忘记拿根树棍在地上温习一下学过的功课；有的孩子为了能上学，不得不去打柴、背砖，用稚嫩的双肩强挑起那个虔诚的梦想；有的孩子眼巴巴地盼望着上学，却因交不起学杂费，不得不离开心

爱的教室，去赶着牛羊攀上山崖。有一座破败的山顶小学，很多事都从简或省略了，惟有国旗每天要升，当一个孩子不得不辍学离校时，他对同样悲痛的校长说：“我家那儿可以看到国旗，看到国旗我就不怕了，我知道我有回来的希望。”

据1996年国家统计局所属美德兰信息公司对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安五大城市做的调查结果显示：上述城市0.1-12岁的孩子每月消费总额超过35亿，每月每个家庭为孩子花的钱平均是672元，北京的一个孩子要花764元，上海其次，为736元。北京12岁以下儿童一个月的消费总额高达14亿元。也就是说，大都市里孩子们身上那一件件漂亮的名牌服装、脚下那一双双潇洒的高档鞋袜，穿掉了成千上万农民家庭的一年纯收入。

你是否发现你的孩子已经把随便扔馒头、丢铅笔当做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是否看到了你的孩子在同学中间热衷于送礼、开“派对”、穿名牌，潜意识里把节约与寒酸、“丢份”、“土老冒”划等号？你是否感觉到了你的孩子拥有了一流的物质生活条件，却不懂得珍惜，视学习为吃苦，视吃苦为受罪？你是否意识到了你的孩子空有一副“智商高、学问深、见识广”的现代包装，却难以承担基本的责任和忍受小小的挫折，更很少了解和关注过与他们同龄的农村孩子那艰难困苦、破陋贫寒，奇怪他们为什么只吃窝头不喝牛奶？如果是，你不妨让孩子翻翻这些浸满泪水的照片，看看这些农村孩子的故事，凝视一下“大眼睛”里流出的忧郁……

“大眼睛”已经默默地看了我们十年，她的眼神引发了什么，是“希望工程”收到的20亿捐款，还是在中华大地上崛起的8000多所希望小学？人们大都知之不多。大家倒是更关心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她怎么样了，学习好吗？甚至还在怜惜她美丽的眼神——她的眼睛还那么大吗？不奇怪，那双征服了世人的大眼睛，它的美丽使那么多人重新认识、肯定了自己进而感到欣慰和骄傲：“我捐过，我救助过，我做过。在黑暗中我曾为她点亮过火把；在沼泽中，我曾搀扶过她走出泥泞；在焦渴时，我曾为她掬起过一捧泉水；在饥饿时，我曾分给她半块麦饼……”它的美丽召唤出如此众多的良心和善良，它的美丽慷慨地点缀了我们短暂寂寞的人生使之变得充实而有价值，它的美丽是这样无私地洗濯我们照耀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一俯首即可采撷它，一回眸就能目睹它，那眼神枝枝杈杈丝丝脉脉点点滴滴地牵扯着割痛着我们的心，人们怎能小心翼翼地敬畏着它、怜爱着它呢？

一、用照相机推动了一场运动

YZXJTDLYCYD

一位响当当的汉子，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地图上凡是等高线密的地方他就画圈，一共画了八个圈——解海龙花了10年时间，行程两万多公里，相当于走了两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奔波了26个省的128个县，接触了100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拍摄了近万张底片——在民族文化宫展览，照片前堆出了一座钱山，半年后，雪片般飞来各地捐款一个亿——在台湾，展期延长到81天，台北孩子哭成一片；在香港，收到捐款1000多万——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位老华人捐款12万美金设立基金会——被誉为“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当代中国摄影家”，解海龙的一张照片就能引来几座学校，希望工程接受的20亿捐款中，很多是为“大眼睛”来的

一位响当当的汉子

拍摄“大眼睛”和“希望工程”那些苦孩子照片的作者叫解海龙。

如果说能有一个人用照相机推动一场撼天动地的运动的话，那就是解海龙。

从一组数字中可以看出解海龙经历了什么——花了10年时间，行程两万多公里，相当于两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奔波了26个省的128个县，接触了100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拍摄了近万张底片。经年累月地在山里拍摄可怜的孩子、普通的教师和破旧的学校，风餐露宿、辗转跋涉，他挨过打、遭过抢，不是一个响当当的汉子，很难承受这些。

是他，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执著靠近了那些山里孩子的真实层面，相机在他手中就像一把利刃，切开了生活表面华丽的皮肤，深入到了别人看不到的肌体：面对大山深处那些向往着上学的孩子，那些穿行在暗夜之中高擎着烛光的老师，那些因孩子失学而愁容满面的父母，那些在我们的主流生活中没有一席之地的山里娃……那种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暴发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让解海龙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

也是他，用真实的图像让人们感动于这个国家的日益强大和人民的坚忍执著。他的照片唤起了人们内心那些富于天性的部分，让人们彼此靠近去相互关怀和敬爱，唤起更多人直面人生的勇气和信念，从而变得更加坚强、务实，在内心困苦的时候从容不迫地度过最脆弱的岁月，顽强地拼搏下去。

解海龙对摄影的痴迷很难用文字来表达。

多年前他刚开始喜欢摄影的时候，最大的心事就是买一台照相机。当时，家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小碗柜；除了工作服，几乎没有像样的衣服。一台海鸥 203 相机 87.50 元，买它时，解海龙卖掉了他和媳妇两个人的手表，还有她的大衣和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不久他又相中了一台放大机，每天一下班，总要去照相器材商店，蹲在柜台下一看就是半天，把售货员都看烦了，问他买不买，不买以后可不摆了。得，这意思就是以后连看的权利也没了。

他不能去看了，可那台宝贝不停地在他眼前晃呀晃的，把他折腾得五迷三道。75 元哪！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卖的了。到哪去弄钱呢？血！想到这儿，他猛地站起来，一路小跑着来到崇文门内的同仁医院，近乎乞求地对医生说：“我身体没毛病，能不能卖 200cc 血？”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按老北京的话说，冷得邪乎，手伸出去，不一会就冻僵了。可当解海龙拿着卖血的钱往商店跑时，止不住的热汗全沁在了脑门上。

几年的摸爬滚打，解海龙从工厂调到崇文区文化馆工作，干上了专业摄影，成了“获奖专业户”，获奖作品有几百幅，其中 20 多个是国家级奖项。创作旺盛时期每月都有叫好的新作，自己也喝着小酒喜滋滋地过日子。可偶然，听惯赞誉的耳朵里飘进一丝“杂”音，有人评价他的作品太“那个”了——甜俗得很。解海龙不太服气地回头审视自己拍的那些风花雪月、名山大川、红花绿叶之类，看来去，不由得心里一惊，可不是吗，不仅是“甜俗”，离“媚俗”也就一步之遥了。《人民日报》著名摄影记者蒋铎曾经问过他，还有多少作品没发表过，说看那些作品才知道一个摄影师是否沉得下去，是否有思想。解海龙一怔，他没有，因为拍了就能发表，

也急于发表，急于得奖。

找不到感觉的滋味不好受，人像被蒸发了一样，好像是不存在了。那段日子，他接连两个星期足不出户，每天出门的是一堆空酒瓶，他想得脑袋疼：“该走什么样的创作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初,很少有摄影家去关注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并不是这些摄影家缺少智慧和能力,而是那种由来已久的摄影观念,将他们引向一条注重政治宣传功能和图像语言符号化的道路。那种主题先行式的图像制造,那种着眼于长城、长江、黄河、天安门广场等等地域性历史符号的宏大叙事,成为许多摄影家流行的模式。

解海龙读了“罗伯特·卡帕”的传记。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摄影爱好者，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为世人留下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照片，那是他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卡帕 1954 年 5 月 25 日在越南战场，不幸踩上了一颗杀伤性地雷，死的时候，那台被他视为生命的照相机还紧紧握在手中。

卡帕生前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拍出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战火不够近。”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这话对解海龙的震撼令他终身难忘。伟大的成功从来不是出于偶然和取巧，它永远属于那些用一生的血汗乃至生命在沙场上拼搏的人。

解海龙回过一次老家，他曾在那里上过一段小学。他小时候家里很困难，印象里对“上学”最初的记忆，是他六岁时在一所四面漏风、破破烂烂的小学里读书。全校只有一个老师，给前面的孩子教完拼音，再给后面的孩子教珠算。最难忘的莫过于开学时母亲在煤油灯下数钱的情景。当时家里孩子多，一到开学时，母亲都会把他们几兄弟的学杂费分出来包好，开学时让他们第一个交给老师。有一次，他把母亲给他的两块五毛钱学杂费弄丢了。回来后，母亲哭着让他跪了一夜。她说：“你要给我记住，这钱咱们丢不起。”

老家的山水牛羊、风土人情在解海龙心灵上的印象大体上是模糊的，可儿时故乡的贫困却历历在目。他去看了儿时的学校，所见到的一切让他震惊，分明是他小时候农村生活的翻版：十来岁的女孩子，背着三四岁的弟弟，在学校门口徘徊；穿得破破烂烂的小男孩，拾完柴回来就在学校门口坐着不走，听里边的孩子们时断时续的读书声。碰上乞讨、卖艺的孩子，解海龙总要上前问：“你怎么在这儿？”回答常常是“俺家没钱”，或者是“俺爹妈有病”。

后来他去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创作。在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一个班里11个孩子全都剃了光头，解海龙很奇怪，一问才知道孩子们是卖了头发换学杂费。学历最高的孩子叫张胜利，读过三年级，为了不辍学，他卖了自己的头发又把全村人剪掉的指甲收集起来卖了，就这样，凑足他的学杂费也还要一年半载。也就是在涞源县，解海龙看到一面墙上有一幅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种标语现在哪儿都是，可当时他却是头次见，霎时，他站在标语前迈不动步了。

“拍摄农村孩子的失学问题！拍那些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生活、学习、苦乐，让世人了解他们的情况，唤起人们的良知，向他们伸出仁爱之手！”——目标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集中地凸显出来。

解海龙不再等了，他开始准备磨光手中的“武器”，像卡帕那样奔赴浴血奋战的“沙场”。

他找到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谈了自己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相见恨晚，青基会急需这样一组照片。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提了一件事，就是给他一份贫困山区的分布图和一封介绍信。与青基会签合同的时候，他只字没提钱。没想到青基会的同志额外加了一句——资助5000元，用以购买较好的胶卷。解海龙拿着5000块钱激动得手都哆嗦，当时那可是个大数，他这辈子还从没拿过这么多钱。



能够上学是这些孩子们的最大愿望

(1993年10月 贵州省水城县金盆乡中心小学)

下班后他买了一张中国地图，在家里边挂好了以后，天天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瞄。他发现中国的版图上有这么几个地方是值得去的，一个是老区：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等；一个是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凡是地图上这些等高线密的地方，他就一圈一圈地画，一共画了八个圈。然后就算，这八个圈，得多长时间把它跑完，得花多少钱的车钱，得拍多少钱的胶卷。精打细算后，他就打起背包上路了。

1991年4月4日，是解海龙终身铭记的日子，他迈出了拍摄贫困农村失学儿童的第一步。

那一刻，所有瞻前顾后的疑惑、裹足不前的懦弱、名利缠身的浮躁和随波逐流的浑噩统统被抛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人生的一堂大课

日历一页一页地撕去了，解海龙循着天空飞鸟的痕迹在穷乡僻壤中奔波，在深山里出没，在高原上独行，在荒野上跋涉。

他以一个摄影家的身份，接触了中国最底层的赤贫者。他拍摄了一个个失学孩子渴望求知的故事和无计其数的破烂桌椅。他目睹过一场场农家学子与贫穷的惨烈决战：买不起灯油，就到人家的窗口边上借光读书；为了省出每一分钱来交学杂费而不吃菜、不吃油甚至不吃饭。他见过无数和苦孩子相依为命的老师，他们为了自己的学生而付出了一切——家庭乃至生命。他常常流着泪采访，流着泪拍摄，往往是一个心酸的故事在心头还未溶化，又见到了更为辛酸的情景，到最后几乎不堪重负，几乎被这辛酸击垮。

搞了几十年摄影，解海龙似乎才明白摄影的生命力所在。

他自己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一切……

他遭过抢。那是从宁夏开往陕北的公路上，长途汽车路过了定边、靖边、安边，这“三边”是陕西出名的穷地方。解海龙一上车就直接坐在最后一排紧靠左手的角落里，双手抱着摄影包，里面是他的命根子——摄影器材和几十个胶卷。

车开到半路，突然上来了五个人，前边三个，后边两个，把车门一关，其中一个大汉掏出刀子逼住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可怜巴巴、哆哆嗦嗦地刚说了一声：“我没钱……”话音还没落地，刀已经紧紧贴在老太太的脖子上，稍微一动，就会鲜血淋漓。

“我……拿，我拿……”老太太带着哭腔颤颤巍巍地从兜里拿出包着钱的旧手绢，被歹徒一把抢走。

车厢里鸦雀无声，人们面如死灰，灰色的面孔、灰色的瞳孔、灰色的呼吸，只有抢劫者从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咆哮，伴之以耍刀数钱的摩擦声。乘客中谁都不敢出声，坐以待毙般的麻木，连哀求、哭泣都已凝固住了。

解海龙心里一阵愤怒的刺痛。

“老兄，献点爱心吧！”一个汉子逼住了他。

解海龙望着歹徒那油汪汪的脸和肥厚的下巴、细小狡黠的眼睛，一时无语。

“嗨，这包不错呀！”一只毛糙粗暴的手伸向他的怀里。

“别动！”解海龙大吼一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哪儿涌出那种抗争的力量和不顾一切的冲动。

歹徒也被这愤怒的吼声震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是记者！”解海龙掏出了采访证。

拿刀的歹徒把目光投向前门一个瘦猴似的家伙：“大哥，这儿有个记者。”

“瘦猴”正在那儿抽烟，一听这话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我看看！”

拿刀的歹徒赶紧把采访证举起来。

“瘦猴”一看，马上给同伴使了一个眼色，让司机开门，然后冲着他的同伙喊了一声：“优惠记者，走，下车！”五个人悻悻地溜了下去，呼啦一声，门关了。

这戏剧性的一幕，让解海龙始料未及。

濒临恐怖极点后又返回安全，这巨大的反差，让他的心像猛然打翻了调味瓶，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

“优惠记者”，让解海龙哭笑不得，也让他沉思良久：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心里居然还残留着一丝对“记者”的敬畏，是对知识还是对权力的崇拜在这场善与恶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解海龙不得而知，但此刻，他感觉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很沉重。

一次是坐火车，当时是在甘肃，解海龙摸黑走夜路去火车站，几个小时后，眼前终于出现铁路旁亮着的信号灯。候车室里两条破旧长椅早已被赶夜车的人占满，解海龙一屁股坐到墙脚下，不一会就在难耐的疲倦中沉沉入睡。也不知过了多久，两条平伸在地上的腿被过往的行人绊了一下，解海龙迷迷瞪瞪直起身，揉揉眼睛定定神，距火车进站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站起来去售票口买车票，刚掏出一张百元票，还没伸进窗口，只听“噌”的一声，钱被人拽住了。解海龙下意识地一挣，钱撕了，被抢走了一半，他脑袋“嗡”的一下，全醒了，回头一看是个半大的孩子，正拿着那半张钱跑。解海龙心一沉，没去追，又掏出一张钱来买了票。

随着拥挤杂乱的人流进站，解海龙不由自主地护住了摄影包。“别走！”一个肮脏不堪的孩子挡住了去路，那种丝毫不顾忌别人脸上的鄙夷、没有半点廉耻的神态和扬扬得意拿着半张钱的小黑手，解海龙至今难忘。

“把那半张钱拿出来！”小男孩逼着解海龙。

“你要它干吗？”解海龙问。

“别管，你要那一半又没用，那是我的钱。”

如果说解海龙刚才还有一丝给他钱的犹豫，此刻已完全打消了念头。

这件事也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物质上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穷。解决物质上的贫穷靠发展经济，解决精神上的贫穷非得靠教育不可。



回家过年的人们陆陆续续都下车了，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解海龙蜷缩在角落里。

刘广辉 摄

第一次在外边过年是在去山西的途中。上了火车才发现人出奇的少，一听车上的广播，解海龙才知道今天是大年三十，这个除夕要在车上过了。走了两三个时辰，回家过年的人们陆陆续续都下车了，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解海龙和陪他的一个影友蜷缩在角落里。女播音员报着餐车里的菜名：西红柿炒鸡蛋，醋熘白菜，红烧排骨……报得诱人，可惜餐车不是囊中羞涩的他可以去的。解海龙泡了包方便面，热乎乎地下肚，竟也不觉得饿了。

墟烟野景夕阳晚霞都一齐沉入了夜的寂静，看那车窗时，是自己的影子，很憔悴的影子。女列车员最后一次巡视时，对他投来同情的一瞥，或许想说，过年了，一人在外，不想家吗？火车单调地“哐啷、哐啷”地响着，冷风在车厢里嗖嗖地窜。原来以为在家过年无非就是团团圆圆、吃吃喝喝、歇歇玩玩，没什么意思，可现在这点“意思”却让他一遍一遍咀嚼了个够，竟有点泪湿衣襟。他把摄影包垫在头下，把身体缩成一团，闭上了眼睛：虽然是出门在外，可毕竟还有家人的期盼和祝福背在身上，只